

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与 资本主义的互动关系

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相对稳定和繁荣。但是，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仍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着前提，社会主义运动构成资本主义更新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将长期呈现冲突与合作并存的局面。在全球化进程中，两种制度之间的冲突会发生，但冲突的方式和解决冲突的手段会有所变化；两种制度由势不两立的对抗关系转变为更多的合作关系，并且这种合作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出现加深的趋势。



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在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内部新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多和积累，这种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将会为新社会的产生创造必要条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使人类社会的未来趋近社会主义，

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条件。

（一）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获得较快发展

20世纪40年代，以原子能的利用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始出现。20世纪70年代后，微电子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并被广泛应用到生产实践中，由此科技革命再次掀起新的高潮。这次科技革命既是20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革命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生产技术在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基础上的进一步信息化，并向智能化迈进。这次科技革命不仅是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在社会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当代科技革命具有科学技术一体化发展、主导技术群体性发展，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式发展等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第一，当代科技革命在科学与技术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基础上，呈现出一体化发展趋势，即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科学技术化主要是指科学越来越离不开技术的支撑，并且向技术转化的速度愈来愈快。技术科学化是指当代高技术都是以深厚的现代科学理论为基础的，具有极高的科学含量或知识含量。科学和技术的一体化发展，使科学和技术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界限越来越模糊。^①“科学技术”一词的广泛使用，反映了“科学”和“技术”之间的联系和一体化发展趋势。如在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等领域中，科学和技术各自所具有的特定含义往往是难以区分的。第二，当代科技革命呈现主导技术群体性发展的特征。当代科技革命中产生的高技术，并不像前几次技术革命中产生的技术那样有一项主导技术，如蒸汽动力技术、电力技术、电子技术等。当代科技革命的主导技术不是一项技术，而是由信息

^① 参见殷登祥：《当代科技革命发展的基本特征》，载《党建研究》，2003（5）。

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新制造（加工）技术、激光技术、海洋技术、空间技术等组成的一个高技术群。这个高技术群还具有内部相关的结构：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和信息技术分别对应着人类文明的三大支柱——物质、能量和信息，这是整个高技术群的基础；空间技术、海洋技术和生物技术代表了人类向宇宙空间、海洋和复杂系统三个方向的发展；新制造（加工）技术和激光技术则是一种可以在各项技术和实践活动中应用的技术手段。不过，虽然在当代科技革命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一个高技术群，但其中各种高技术的性质和地位并不完全相同，信息技术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对工作速度、效率和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由于大规模集成电路及微型计算机的出现，加之社会生产的技术方式从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发展到信息化，信息技术逐渐应用和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一切领域和方面，使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① 第三，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式发展，是当代科技革命的又一个重要特征。随着当代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发展，科学、技术、社会这三个基元，形成了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技术—社会这些二元关系，以及科学—技术—社会的三元关系。因为科学、技术、社会三者都是一个母系统，各有其自身的子系统，在子系统和母系统之间，又会构成各种各样的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多样化，彼此发生转化的周期也越来越短。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科学是基础，技术是核心，社会是方向。^②

在当代科技革命的带动下，信息、微电子、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空间、激光、海洋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方兴未艾，产业结构出现重大调整。在发达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的信息化，使信息、教育、研究开发、咨询、服务等第三产业异军突起，已经成为产业结构中居主导地位的经济部门。以计算机和网

① ② 参见殷登祥：《当代科技革命发展的基本特征》，载《党建研究》，2003（5）。

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业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广泛推行知识密集型生产与服务，以信息产业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美国在此次变革中发挥了领头羊的作用，并成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

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美国经济自1991年3月恢复以来，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直至2001年3月才陷入衰退。这一时期成为美国有经济周期记录以来最长的经济扩张期，并且这一轮的经济增长呈现出与传统经济不同的“两高两低”的特点，即经济增长率高、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高、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并且本轮美国经济的衰退表现得十分平缓。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利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有利时机，率先完成了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从而使美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地位大大加强。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高科技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的迅速兴起和发展。由于美国具有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并采取了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美国在全球性的产业结构分工中抢占了先机，在发达国家中率先完成了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并主要致力于发展高科技产业。一方面，它通过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污染严重、附加值低的产品，如食品、服装、钟表等轻工业产品和钢铁、有色金属、水泥、塑料、石化产品、船舶、通用机械等，使这些低技术水平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美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起新型的产业间分工体系，以使美国能集中精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另一方面，它通过与发达国家互通知识与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使发达国家间的水平分工日益扩大，产业内分工更加细致，使自己致力于核心技术产品的开发与生产。这样就进一步推动了美国产业向更高级的技术密集型发展，从而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了有利地位。20世纪90年代美国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信息化方向演变的突出表现就

是信息产业的迅速崛起。目前美国中央处理器（CPU）芯片占世界市场份额的90%，应用软件占50%。美国信息产业已取代钢铁、汽车、建筑等传统产业成为美国最大的支柱产业，是美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1995年至1998年间，美国1/3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在同期GDP 4.1%的增长率中，信息产业的贡献达1.2个百分点，计算机和电信工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超过24%。^①同时，高新技术促进了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改进了企业的管理，提高了管理效率，并且使传统产业相对过剩的状况大大缓解，特别是利用计算机管理，使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成本大大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行平稳，科技创新较为突出，生产力获得了较大发展。

那么，这样一个科技革命全方位、加速度大发展的新时代将会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变化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呢？中国学者高放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头掀起的这场新科技革命确实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科技和生产力的大发展不是资本主义朝阳的升起，不是资本主义的起死回生，而是资本主义的回光返照，是资本主义的晚霞。^②现代科技革命究其实质，是生产力革命，是管理革命和知识革命，同时，也是人类解放最重要的物质条件。^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对基本矛盾的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封建社会内部逐步发展起来的，它在经由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发展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阶段之后，随着生产资料使用的社会化、劳动过程的社会化和劳动产品的社会

① 参见刘树成、张平：《“新经济”透视》，30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② 参见高放、李景治、蒲国良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4版，296页。

③ 参见刘大椿：《论现代科技革命的实质》，载《成人高教学刊》，2002（5）。

化程度日益提高，就使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产生了对抗性的矛盾，这一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集中表现。而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它自身固有的这个矛盾，不可能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由此马克思、恩格斯得出结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①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扬弃私有制、消除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创造了更可靠、更充分的物质条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奠定了雄厚的、充实的物质基础；更进一步看，未来科技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还为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准备了前提；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会使人人受到良好的思想教育，得到良好的社会训练，从而极大地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和思想境界，扬善抑恶，使集体主义、人道主义、博爱主义等大放异彩，使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嫉妒心、报复心等人性之恶大为减少。这样就可以为未来“自由人联合体”准备好思想条件。^②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为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

（二）资本主义内部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

当代资本主义内部产生了许多社会主义的因素，从而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了条件。马克思曾经说过：“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自发地产生的。”^③当代资本主义在对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和体制模式进行相应调整的过程中，产生了国有经济、合作社、股份制、经济计划、社会福利等促使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创造了扬弃资本主义的新的经济制度因素，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准备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84页。

② 参见高放、李景治、蒲国良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4版，297~29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4卷，3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条件。

第一，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占有形式出现了社会化。当代资本主义调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和体制模式，在坚持私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对财产所有形式进行调整，突破了那种单一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合作经济、股份经济不断发展，混合经济的特征逐步显现，资本占有形式日益社会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了国有经济。西欧各国在邮政、电讯、电力、煤气、铁路、航空、采煤等国民经济的命脉行业上基本实行了国有化。20世纪80年代后，资本主义各国开始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执政后，英国大力推行股权私有化，经过15年的努力，原国营公司只剩下伦敦汽车公司、邮政局和核能原料公司3家，英国的持股者由300万增加到1200万，占总人口的22%。^①但国有经济依然在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命脉行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股权已高度分散化了。有资料表明，在美国约有一半家庭持有股票，股民人数高达6500万，其中大部分当然也是劳动者。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还出现了职工股份所有制经济。目前，美国持股人数为4704万，占全美国劳动力的40%。而美国持股计划则已发展到1万个，约10%的美国劳动力加入这项计划。1995年，德、日、法、英、美和加拿大的股民数分别占本国人口的5.4%、9%、10.1%、17.5%、21.1%和25%。股份制虽然只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具体实现形式上的改变，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因此，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出现了新的实现形式和新的资本组织形式，如股份公司、跨国公司、垄断资本组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① 参见吴江：《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59～6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等，这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消极扬弃”的经济因素，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有利阶梯，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股份制虽然只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具体实现形式上的改变，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迅速增长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曾从多方面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客观上为社会主义的来临准备着条件，股份制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马克思说：“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①。马克思还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合作工厂与股份制企业加以对比考察。他说：“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后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前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② 马克思以后的一百多年来，股份公司有了新的发展，而且不断出现了新的资本组织形式。它们都是转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因为作为新的资本组织形式，它不会直接触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但由于私人资本转变为社会资本，从而为社会主义提供社会经济条件。这种调整表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距离社会主义愈来愈近了。

第二，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就业结构、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工人阶级队伍。20世纪下半叶，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

① 《资本论》，第3卷，4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② 同上书，497~498页。

化以及生产力水平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一般是指除去企业经理、行政主管、专业人员和自我雇佣工作者之外的所有工薪劳动者，所以它实际上包括了从事非技术工作和半技术工作的蓝领工人，也包括从事技术工作的白领工人，还包括有时被划入中产阶级下层的白领职员。随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工人阶级的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是产业工人大量减少了，服务业的工人大量增加了。以英国为例，1971年至1996年，制造业的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从30.6%下降到18.2%，矿产、能源和供水业的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从9.5%下降到1.1%。曾是英国工业中心的曼彻斯特，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制造业在全部销售额中的比重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70%下降到20%。与此同时，服务业迅速发展，1971年至1996年，英国服务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从52.6%上升到75.8%，其中发展最快的是金融保险业和教育、医疗以及其他公共服务机构。^①

二是蓝领工人减少了，而白领工人增加了。蓝领工人一般指从事体力工作的工人，而白领工人指从事非体力工作的工人。由于发达国家中生产部门的技术和机器设备不断地更新换代，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电脑的数码控制愈来愈普及，对工人的技术要求也愈来愈高，同时，随着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一定的教育水平和专业技术训练也成为就业的必要条件。1968年至1997年，英国的全部就业人员中，从事体力工作的蓝领工人所占的比重从66.5%下降到34.5%。随着产业部门技术结构的变化，目前英国的政府部门和学术界都愈来愈倾向于用技术工人、半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来进行新的工作性质的技术划分。如果我们用半技

^① 参见李培林：《英国近20年社会结构的变化》，载 www.china.org.cn/chinese/ch-wzh/2.doc。

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来定义蓝领工人，那么到 1996 年，蓝领工人就占就业人口的 20% 左右，而其中的非技术工人只占就业人口的 5% 左右。另外，女性工人中的半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比重分别要比男性工人高近 5 个百分点。^①

三是在低工资部门工作的工人，工作状况和生活状况有恶化的趋势。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当时规定工作 6 个月以上可享受解雇方面的劳动保护，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规定已改为工作两年以上才能享受解雇方面的劳动保护。1975 年至 1995 年间，在解雇方面没有劳动岗位保护的雇佣劳动者占就业人员的比重从 9% 增加到 30%。英国因为没有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所以低工资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水平比欧洲其他发达国家要低，人数也多。1976 年至 1996 年间，英国最低 10% 工资收入层与最高 10% 工资收入层的工资收入差距从 2.5 倍增加到 3.5 倍。企业老板为了减少雇员，压缩雇佣方面所必需的福利支出，往往使工人以加班的形式进行超时工作。1984 年至 1996 年，全日制就业人口中，每周工作 48 小时以上的人员从 275 万上升到近 400 万，约占全日制就业人员的 1/4，其中多数是体力劳动者。工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快速更新使缺乏技术的工人中长期失业者占的比重较高。在 1996 年英国的全部失业人员中，失业 1 年以上的占 38%，失业 2 年以上的占 24%，失业 3 年以上的占 16%。^②

在阶级关系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实施“人民资本主义”、“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等措施和手段，使阶级矛盾得到缓和、阶级利益得到调整，在阶级利益与阶级意识方面的所谓“一体化”和“趋同化”加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必然对作为传统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革命性形成挑战；在阶级关系方面的“一体化”与“趋同化”对“两个必然”的实现也会带来消极与不利的影

^{①②} 参见李培林：《英国近 20 年社会结构的变化》，载 www.china.org.cn/chinese/ch-wzh/2.doc。

科技革命的到来，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劳动者科技知识、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利于增强工人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素养，锻造新一代的革命阶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的地位有所提高，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成了一种趋势。西欧各国纷纷推出了“共同决定制度”，它要求企业必须吸收若干名工人进入董事会，参与企业管理。在德国，职工超过1 000人以上的公司监事会必须有1/2的工人代表，这些代表在监事会中与资方协商解决公司的一切重大问题。职工超过500人，少于1 000人的企业，监事会中要有1/3的工人代表参加。同时，企业中还成立职工委员会，维护工人的正当权益和利益。任何企业均不得随意解雇工人，必须解雇时，要同工会协商，并给予补偿。在法国，拒绝考虑职工代表要求或忽略职工代表咨询意见的厂主属于违法，罪名是妨碍罪。在瑞典，厂主要定期向工人提供有关生产和人事方面的情报，一切大事要同工人代表协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瑞典还规定一切大公司都必须将利润中的一部分纳入工人投资基金，使职工通过工人投资基金，对企业施加更大的影响。这种所谓“基金社会主义”得到了许多人的肯定和支持。^①1980年，美国政府、工会、资方签订了一项“全面谅解”的合作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一些企业开始吸收工人代表进入董事会，而更多的企业则实行人本管理、民主管理、吸收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无疑是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和雇佣劳动制的否定因素，是新社会赖以生存的肯定因素。^②资本主义各国推出的吸收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说明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压力下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社会主义因素。所有这些无不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所发生的变化，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历史

^① 参见罗文东：《论当代资本主义内部的“新社会因素”》，载《理论前沿》，2004（14）。

^② 参见陶承德、叶光林：《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社会主义因素的生长》，载《理论视野》，2002（3）。

进程的一种特殊体现。

第三，推行宏观调控和社会福利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大都实行的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模式。当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不再具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特征。它们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充分重视经济计划的作用，加强国家干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对国民经济的计划调节和宏观调控已贯穿于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市场经济的波动性、盲目性和破坏性，从而促进和推动了经济发展。从1948年到1992年，法国已制订了10个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其中有部门计划和国家宏观计划，有部门发展速度和数量指标，也有国家总体的发展战略和方向，还有部门及地区经济的协调和平衡。这些计划调节使法国经济呈现出有序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日本、德国、荷兰、英国等地也都相继推行了经济计划化。在宏观调控方面，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了过去那种“守夜人”的角色，整个经济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外，又增添了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增强了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节。尽管积累的决策权仍然依靠私人公司，但是决策最终是否采用，还必须同公共机构进行磋商之后才能决定，并且政府部门和银行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间接的影响。国家不仅掌握经济命脉和大量的国有企业，而且还通过经济、行政、立法、金融等手段来直接调节经济，保持国民经济平衡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运行的无序状态，使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经常出现的大起大落的经济波动趋于平缓。^①

为了缓解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内在矛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其根本制度所许可的限度内，对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作了一些较大幅度的调节、改良，包括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做法，推行了许多在客观上有利于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改革。如实行劳动

^① 参见赵冰：《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1）。

法、最低工资法，提供公共福利、公共卫生体制，征收遗产税和累进所得税等措施，逐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成熟的新体制。同时，资本家在劳动的管理上也由过去把工人看做“会说话的机器”，逐步转变为把他们看做“经济人”、“社会人”；由单纯依靠强制力、规章制度和纪律条文进行管理，逐步转变为强调激励手段，在管理中渗透情感和精神等因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存环境。在分配形式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在坚持剥削为特征的按资分配的前提下，通过税收“抽肥补瘦”等手段，不断加大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使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趋于普遍化、收入分配趋向兼顾公平。西欧、北欧一些国家出现了收入均等化的迹象。在 20 世纪初，美国政府开支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5% 至 8%，而到 20 世纪末则保持在 35%。目前，西方国家每年通过税收一般能够集中 13% 以上的国民收入，欧盟国家已近 50%，税收中的 60% 用于贫困救济、免费医疗、失业补贴、养老金发放、教育等社会福利开支。福利国家制度促进了西方经济发展并部分实现了社会平等与公正的目标，但它并不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良方。它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中所选取的平衡点并不总是能有效地维持，在资方与劳方、国家与市场之间达成的妥协也并不总是能保持稳固。收入分配领域中“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对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及缩小贫富差距具有明显作用，体现了收入分配公平化方面的社会主义因素。

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产生着重大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大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以及合作经济、社会保障、职工参与管理、福利制度的完善等“新社会因素”，为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准备着日益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充分的社会历史条件。

（三）阶级对立、贫富悬殊由国内向全球扩展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由于宏观调控和福利政策的推行，

阶级对立、贫富悬殊有所缓和，但这并不表明这些国家就消除了阶级对立、贫富悬殊。当代西方社会中的阶级结构日益呈现多重相悖的趋势，即社会分层指标的多元化和社会阶级的两极分化，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和社会流动性的相对降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普及和贫富差距的扩大。虽然有组织的阶级斗争在减少，但是阶级之间的冲突有增无减。与此同时，西方各国政府对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力在降低，这种状况证明西方社会并非处于一种十分良好的状态之中，而是孕育着复杂而危险的矛盾。^①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情况看，阶级对立、贫富悬殊有加重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了所谓的“新经济”奇迹，美国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经济竞争力明显提升，但普通劳动者并没有从“新经济”中受益。在美国，1979年最富的20%的人的收入，比最穷的20%的人高出3.5倍；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个差距已经扩大到9倍。1992年至1998年间，全美10%收入最高的家庭与20%收入最低的家庭之间的差距拉大了9%，而1998年至2001年间拉大了70%。目前，全美20%收入最高者拥有全美50%的收入，5%的最富有者占全美总收入的百分比由2000年的22.1%上升到2001年的22.4%。特别是全美无家可归问题的严重程度，已经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水平。近十多年来，英国信息和信息服务业迅猛发展，IT（Information technology）产业已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术语，特别是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已成为就业人员增长最快的领域，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低增长趋势。但是英国近十几年来收入差距在扩大，贫富悬殊的现象有加重的趋势。根据英国国家税务局的调查，1994年英国可以验明的全部个人财富的净资产价值的总额是1.3万英镑，其中不动产净值占60%，动产净值占40%。1980年至1994年，英国拥有个人资产的成年人口从4135万增加到4500

^① 参见李景治等：《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与矛盾》，131~13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万；在具有交易价值的全部个人财富中，5%最富有的人的财富占财富总额的比重从36%上升到38%；拥有10万英镑财富以上富人所占的人口比重从1%上升到8%；而50%的下层财富拥有者的财富在财富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9%下降到7%；衡量财富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从0.65上升到0.66。如果加上不具有交易价值的个人拥有的职业养老金权益和国家抚恤金权益，则财富分配的贫富差距较之具有交易价值的财富分配中的贫富差距会有所缩小。但从近十几年的发展来看，贫富差距仍然是扩大的。1980年至1994年，在全部个人财富的分配中（具有交易价值的财富加上职业养老金权益和国家抚恤金权益），5%最富有的人拥有的财富份额从24%上升到25%；而50%的下层财富拥有者的财富所占的份额从21%下降到17%；衡量财富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从0.46上升到0.49。财富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中等财富拥有阶层的分化，该阶层一部分人更加富有了，而另一部分人相对来说更加贫穷了。^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也加剧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贫富悬殊现象似乎都呈现加剧的态势。

同时，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对立、贫富悬殊呈现出由国内向全球扩展的新特点。全球化进程中受益的不均衡性使南北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特别是表现出发达国家与穷国弱国之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事实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南北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一边是北方发达国家财富的急剧膨胀，一边却是南方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日益加剧。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生产的物质财富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增长仅6倍，但占世界人口20%的少数富国与一批穷国，其占有社会财富的比例差距，则从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7

^① 参见李培林：《英国近20年社会结构的变化》，载 www.china.org.cn/chinese/ch-wzh/2.doc。

年的 74 : 1。目前，世界上 1/5 的人口生活在美、日、德、法、英及北欧那些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控制了 86% 的世界出口市场、68% 的外国投资。世界上最富的 20 个国家的平均收入是世界最穷的 20 个国家平均收入的 37 倍。世界上最富有的“七国集团”所拥有的 200 家较大的跨国公司占有的财产，1997 年占世界生产总值的 33%。如果把这类跨国公司的数额扩大到 500 家，则“富国俱乐部”的这 500 家企业就占世界生产总值的 45%。在发展中国家，有 8 亿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这一数字超过了工业化国家目前劳工总数。据 2003 年 11 月 25 日联合国粮食组织的报告说：2001 年 9 月联合国新千年首脑会议上设定为联合国首要任务的到 2015 年将世界饥民减少一半的目标将无法实现；在过去的 20 世纪 90 年代，只有包括中国在内的 19 个国家的饥民人数减少了，另外 17 个国家的饥民人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有些减少，但营养不良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激增。当前，全世界大约有 8.42 亿人因挨饿而营养不良，而且这一数字每年仍以 500 万的幅度在增加。^① 全球性贫富分化正成为世人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全球经济健康发展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

马克思、恩格斯做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既不是出于痛恨资本主义的道德义愤，也不是源于向往社会主义的良好愿望，而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科学分析。“两个必然”之所以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就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和运动。历史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深化，并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国内，当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表现为经济结构性失衡；在国际上，则表现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向全球的扩展。

^① 参见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641 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第一，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经济的结构性失衡。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是以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是它绝没有消失，而是继续为资本主义社会制造着麻烦，继续积累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否定的因素。同时，更应该看到，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各种问题不单单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表现形态上的变化与数量意义上的积累，而且是这一基本矛盾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行而进一步向结构性矛盾或危机的方向发展，是基本矛盾的对抗性质在继续深化。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调控在克服市场弊端的同时，又以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增长以及“滞胀”的方式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新的矛盾与障碍；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应用又使科学技术本身与劳动相对立，带来了结构性失业；科学技术创造了生产不断扩大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可能性要变成现实性却越来越受到居民消费能力有限的束缚；在利润率驱动下发达起来的经济生活，不仅伴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不平衡，也伴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与发达国家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直接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严重浪费，已经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当今资本主义经济中还存在着许多体制性问题，最明显的就是福利制度的危机和世界货币金融体制不健全所蕴涵的严重风险。所有这些矛盾、危机归结起来无非就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关系越来越难以驾驭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与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力。总之，发达资本主义经济面对的最大难题和存在的根本矛盾仍然是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可能通过对经济体制与政策的调整来部分地改进生产关系，缓和这一矛盾，但是它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界限，它只是在不自觉地为根本上的自我否定创造着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①

^① 以上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经济的结构性失衡的论述，主要参见李景治、林甦主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100~102页。

第二，资本全球扩张中不可克服的矛盾。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综合结果和外在表现。经济全球化将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扩展到全球范围，也不可避免地把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扩展到全球范围，在全世界范围内重现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痼疾。全球化在不断扩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把其基本矛盾扩展到世界各地，并由此引发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性危机。首先，全球化导致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一国范围内扩展到全球范围内和多个领域。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在全球经济中，这个基本矛盾演绎成许多具体矛盾，如各国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和可调节与全球经济的无计划和少调节之间的矛盾，跨国公司的严密组织和科学管理与世界市场的盲目扩张和混乱之间的矛盾，世界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市场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各跨国集团之间的矛盾等。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领域的动荡和危机不断发生，给全球经济与政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如1992年、1993年、1995年欧洲货币体系的动荡和危机，1994年墨西哥的金融危机，1997年首先从东南亚掀起的来势凶猛的金融风暴，1998年秋俄国的金融危机以及1999年春巴西的金融危机等。全球经济中的矛盾还导致种种结构性失衡，如美国经常性巨额贸易逆差，欧洲的大规模结构性失业，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长期停滞等。这一切，严重地制约和破坏全球生产力的发展，影响有关国家和地区，乃至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同时，全球化也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加尖锐化，使全球分裂加深。在全球化“凯歌行进”中，“反全球化”的声音和反全球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各跨国公司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与世界市场的无序状态之间的矛盾加剧；全球化使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劳资矛盾加剧，使社会分化和贫富对立日趋严重；资本主义“列强”如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内部的斗争已由过去对“疆域”的争夺，变为对全球经济和全球市场霸权的争夺；而随